

八旬老人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缘分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鸣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

此声巨响,世界震惊,举国沸腾!

距离罗布泊数千公里外的711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铀矿的来源地,成了欢乐的海洋。

“第二天(1964年10月17日)上午上班时,矿里的高音大喇叭播放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大家高兴地喊着,这是我们提供的铀矿啊。”今年84岁的王瑶心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心潮澎湃,得知这一喜讯,711矿干部职工奔走相告,互相祝贺,比过年还热闹。

“大学毕业接到天大的任务”

1961年9月,23岁的王瑶心从中南矿冶学院机电专业毕业,被国家二机部(主管中国原子能事业)“抢”走,安排到位于郴州许家洞金银寨的711矿工作。

“大学毕业时,计划是去北京解放军一部队。二机部来学校选人,看到我学矿业机电专业,还懂点俄语,就动员我去二机部。”王瑶心说,“没想到,刚毕业就参加了一个天大的任务。”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陆续撤走援助中国的各行业专家。1960年初,711矿苏联专家全部撤离,该矿铀矿预选厂(苏联援华工程)建设被迫中止。

1961年10月,刚到矿里报到,王瑶心就被矿领导安排加入铀矿预选厂筹建组,负责预选厂的机电设备安装及调适。

“涉及到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铀原料,对选拔人员要求非常高,必须是又红又专,绝对信得

过。”王瑶心觉得,这是党组织对她极大的信任,也是祖国赋予的崇高荣誉。

年轻且充满干劲的王瑶心,不说二话,不分白天黑夜,撸起袖子拼命干。她借助俄文字典,花了1个多月时间,把前苏联专家留下的机电类俄文资料全部整理分类,并与北京技术专家团队紧密配合,为铀矿预选厂机电设备安装运营作好准备。

“被同事笑称长臂猿猴”

1962年1月,711矿打响铀矿预选厂建设攻坚战,上千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铀矿。

“我就像个男人,下工地、爬高杆,抬机器,风风火火,被同事笑称长臂猿猴。”王瑶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与其他建设者一起铆足劲,赶进度。

1962年12月到1963年5月,预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安装调试阶段。当时,邓小平等首长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预选厂的建设。

王瑶心作为预选厂机电设备技术负责人,每3天通过专线电话直接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

在预选厂铀矿提炼过程中,不时会遇到设备故障。作为核心技术骨干,王瑶心首当其冲要去修理调试。每次她要穿上30多公斤重的铅制防护服,戴上沉重的防护头帽,趴在机器上找故障。有时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脱下防护服时,内衣全部湿透。

1963年10月,铀矿预选厂终于选炼出第一批合格铀矿,并运往衡阳、甘肃等地进一步提炼、提纯。从当年起,711矿实现铀矿规模化开采选炼,每天都能运出一列火车皮。

一块手表

□ 钱永广

假日里,母亲进城来,姐姐打电话给我,邀我全家去她家吃饭。吃过午饭后,姐姐在家翻箱倒柜,我帮她一起把旧的衣物拿到阳光下翻晒,没想到我翻出一块“上海”牌男式手表,虽说此表已有30余年,但在阳光下仍闪亮闪闪的。我把表轴轻轻地拧了一下,这多年前的稀罕物,虽说历经斗转星移,但还是“吱吱”地走了起来。

这块手表,还是多年前的模样。只是我早已不用手表看时间,就在手机刚流行时,我就花了三千多元买了一部时尚手机。可如今我一看这块男式手表,往事还是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我家在村里一直是非常穷的。我上高中后,看到别同学的手腕上都有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我感到万分自卑。一个假日,我回到家里,向父亲提到手表的事。父亲双眼看着地,默默地抽着旱烟,那一刻,我突然后悔不该这样逼父亲。那时,姐姐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农村,时兴以手表作聘礼,就像现在送女孩钻戒一样。姐姐的对象果然从县城为姐姐买了一块小巧精致的女式手表。晚上,只要收音机整点报时,姐姐就会把手表从腕上取下,轻轻地给表轴“上劲”。这时,我就会把头凑过去。每逢这时,姐姐总要夸张地说,这表如何贵重,要防止掉到地上。每次看她戴着手表的神气模样,我就会嘟囔:

“什么时候我能有一块手表就好了!”

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姐姐知道我对一块手表有多在乎。有一次,她主动说,我不上学,要手表没啥用,如果你想要,这表就给你吧!虽然我对手表垂涎三尺,但假如我戴着这块女式手表去上学,同学们肯定会笑话我的,那还不如不要的好!

见我犹豫着,姐姐知道了我的心思。第二天,姐姐偷偷拿着发票,专门到县城找到那家卖手表的店,经再三商量,姐姐终于将自己的女式手表换作了一块防水防震的“上海”牌男式手表。

晚上我回到家里,当姐姐把这块男式手表戴到我的手腕上时,我突然百感交集。这可是姐姐的定情物啊,我怎能让姐姐把她的“聘礼”变换了呢?可那时我被想拥有一块男式手表冲昏了头脑,所以当姐姐给我戴上时,我竟没有加以拒绝。

此后,姐姐的手腕上就少了一个向我炫耀的资本,而我的手腕上有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自从有了这块手表之后,每逢与人说话,我总是很显摆,就怕别人看不见,我总是习惯性地把胳膊大幅度地往前一伸,然后将手臂平端胸前,于是我手腕上的那块手表,就像花一样明亮地开在别人的面前。

高中三年很快结束了,考上大学那年,家里也日渐富裕,父亲帮我从县城买了一块崭新的手表,我不再需

老房子

□ 曹良雄

供孩子上学,怎么办?当时我们全家就没一分钱积蓄,倒是结婚时欠下两万元还没有还清。压力山大啊!

我是1990年参加工作的,那时月工资才一百多元,住的是单位房,每月吃光用光,真正的“月光族”,从来就没想过买房买车的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没办法,就想办法。借钱。向哪里借?我父母是农民,为送我读书已家徒四壁,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向老婆的兄弟姐妹借?他们也面临着要买房的人生大事。有点钱的妻妹又看不起我这个“乡巴佬”。我绞尽脑汁、厚着脸皮、壮着胆子向银行向亲戚向同学向同事向朋友开口了。我的真心真情打动了他们,博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两万、一万、九千、两千,最小数字为一千,总共借了八万多,共借了一家银行和十六个人。我立了个本子,把肖三陈四谢五,姓名数额,要利息不要利息,好久偿还,一一记录清楚。我就跟做梦一样,居然借了这么多钱。每隔一段时间把账本翻一翻,看又还了多少。还钱总没借钱快,整整用了五年才把所有本息还清。

分期交了房子五万的预交款,用余下的三万多在县正街租房的楼下又租一间十多平米的门面开了个小南杂店。

为了早日把欠款还清,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夫妻俩进行了一场五年近两千个日日夜夜的“馬拉松跑”。我进货,妻坐店,父母帮忙。不管春夏秋冬、打雷下雨、寒来暑往,我们吃在店住在店,卖货收钱,夜以继日。店子初开,我好放下面子,见熟人经过就会躲起来。其间有人鼓励过我们,也有人轻视过我们;被骗过被欠过,有欠货款不付者,你去讨他还还要骂你打你。别人过年我们守店,夫妻吵过架,老婆出走过(没走多远,当晚又回来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旁人无法体会。

每还清一笔欠款,我就在被欠人姓名后打个钩,在

“朱德首长握着我的手鼓励”

辛勤付出终迎回报。1963年12月31日,王瑶心作为二机部有突出贡献人员代表,在北京中南海受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幕:首长们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我站在前面,朱德首长握着我的手鼓励说,科技靠你们啰!”此时此刻,王瑶心内心激动万分,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技术,再立新功。

王瑶心回郴后自学上进,编制了《国家机电设备检修质量标准》《核工业部工矿配件消耗定额》《中国TPM全员生产维修教材》等书籍,还承担培训711矿机电技术工人任务,经常被邀请到二机部下属单位讲解机电安装和安全生产课。

1994年,王瑶心退休,才与全家人一起安安心心过年过节。在711矿工作近30年,逢年过节,生产线暂停时,也是机电设备检修更新时,王瑶心总是带头站在一线,一家人难得过一个团圆年。

王瑶心老人的家,位于许家洞镇原711矿家属区,她在这里生活了近60年。

她家屋外四周,几棵柚子树上,圆圆的果实挂满枝头,迎着冬日暖阳,显示出勃勃生机。

“为国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原料贡献力量,我很光荣!”

“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的核事业,我很幸福!”

王瑶心说,人这辈子,真的短暂,年轻真好。对祖国,要有一颗热爱心,对事业,要有一颗上进心。选择核工业不后悔,这就是缘分。



要姐姐送的这块“上海”牌手表了。于是,我把这手表又“还”给了姐姐。姐姐接过手表时,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我想,即使姐姐不能戴,姐夫也可以戴的啊。

可姐夫没有戴,空腕多年的姐姐也没把这块手表当回事,随手就放在了家里的衣柜里,并“珍藏”至今。现在时隔多年,家里富裕了,我们身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姐姐和姐夫也和我一样,早已有了手机,这只手表也被他们彻底遗忘了。可关于这块手表的往事,在我的心中掀起了一阵阵涟漪,让我难忘。

母亲带我去清江羊场上赶集

□ 张泉森

谈起童年在老家农村生活的往事,最有回味且动人心弦的要算赶集,那定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记忆深处的赶集场面,是童年里最温馨的场景,特别是有过一次与母亲赶集卖西红柿的经历,一辈子难忘。

我的故乡坵台,位于湘南山区东江湖腹地的清江小镇,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山村。童年的时候,赶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清江属于资兴二都,二都话赶集也叫“赶闹子”,老家赶集的地方叫羊场。从我家走路去羊场有7公里,道路有点“坎坷”,要经过塘头、上里、带头、上坪、上水坪等村。带头是外婆的老家,有时候还能进亲戚家歇脚,喝上一碗米汤之类的。跟外公赶集,几孙俩偶尔吃一碗木耳炒肉的面条,回来还能带几个糖包子等。

老家赶集的时间是农历“一四七”(逢初一、初四、初七)。每逢赶集的日子,每个村组的乡邻便“倾巢而出”,短短的个把小时,就把平时冷清清的街道搞得热火朝天,在有限的空间里,肩并肩、背靠背、人挤人,每个人的脸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和期待。

那个年代,正当年的父亲在隔壁乡镇滁口工作,母亲带我和姐姐与外公外婆一起在乡下生活。东江库区交通十分不便,父亲基本一两个月回来一次,每年“双抢”、过年能回来一周,那是一种很幸福的时光。这种父亲吃“国家粮”,母亲带着孩子在农村的生活状态,当年还有一个时尚的叫法“半边户”。童年的时代,是个无法摆脱记忆的时代。一家人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起这个家。那时,外公外婆还年轻,带着母亲勤劳耕作,一年还能出栏几头猪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也还算好。有一年,母亲捣鼓种了一些西红柿种子,结果弄多了,吃不完就折腾去羊场卖西红柿。那次,仅仅是因为家里种植的西红柿“丰收”,要挑到集市上去卖,让我感受了母亲的不容易。

天蒙蒙亮,母亲到地里采摘两箩筐西红柿,回家吃过稀饭,戴着草帽,拿起一块毛巾搭在脖子上,挑起西红柿就出发了。一路上,有不少是和母亲一样赶早集的乡邻,靠近集市的带头、上坪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用筐装着满满的蔬菜,有的用自行车或者拖板车拉着土特产,而大多数乡亲要卖东西,都是靠着一根扁担艰难前行。我屁颠屁颠跟在后面,见到的场景不是汗流浹背,就是满头大汗。

到达羊场集上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声鼎沸,马路的两边,是一个接着一个小摊。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狭窄的小道上挨肩擦背,讨价还价声,小贩们的吆喝声,各种嘈杂声,声声入耳。集市上,遇到熟人,特别是各自的远房亲戚或相熟老友,无论男女,都会毫不顾忌地拉起家常,那时去赶集的感觉,完全超过我现在省城逛大商场大超市所带来的惬意。

母亲一边挑着箩筐,一边把眼神向马路两边的空地扫去,终于,母亲物色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老供销社门口,隔着一小条小河的路边。众多摊位间隔中还有一处可以摆放。母亲把箩筐放好,跟两边的摊户说了一句“多关照”后,左顾右盼,等待顾客的来临。而此刻,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坐在护栏边的水泥墩上玩。说玩其实就是坐着不动,让母亲安心卖东西。天生好动的我时而站起来东张西望,时儿坐下向左顾右盼。正前方是清江中学与中心完小,红砖外墙的每间教室玻璃窗户外透着白炽灯的光芒,琅琅读书声飘过窗外,与大街上的吵闹声交汇在集市上空,偶尔听到上课的铃声,让人无限期待。抬头望去,教学楼顶上“为人师表”四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所有的一切,对昔日在大山老家每天晚上靠煤油灯写作业的我特别好奇,梦想自己此刻坐在对面的教室里读书。那时起,渐渐地有了走出大山的初心与梦想。

烈日当空,母亲时不时回头看下我,她一边用草帽扇风,偶尔用毛巾擦汗,一边还和那些买家讨价还价。

“妈,我要吃西瓜”,看着隔壁不远处西瓜摊,我在母亲后面小声说了一句,尽管大街上很喧闹,母亲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她看了下箩筐里还有不少西红柿,丢了一句“你吃个西红柿吧”,“不要,我要吃西瓜”。我能感觉到母亲为难的表情,但还是带我过去,卖西瓜的农妇与母亲年纪相仿,走过才发现是母亲小学同学,黄桥村的淑贤阿姨,她带着儿子兵芳在卖西瓜。淑贤阿姨是个豪爽之人,听说我要吃西瓜,抱起一个大的,两刀下去,一个大西瓜就四边开了,拿起两边就给了我,另外两边给了她儿子。结果他儿子不领情,眼睛盯着我们家又大又红的西红柿说。“妈妈,我要吃西红柿”。母亲要给钱,阿姨执意不要。看着兵芳想吃西红柿,母亲迅速回到自己摊位上用手捧了几个大西红柿放在她手上。我们两个小孩开心地坐在路边吃起来,且完全投入了吃的状态,那样子神气得很。两老同学见面自然聊起了过去,全然不顾生意。不一会儿,我一脸西瓜汁,兵芳一脸西红柿汁,看着大人们笑我们两个人的“腮红”,我们居然不约而同地左手一下,右手一下,直接用手掌擦起脸来,那样子搞笑得很。

老家的集市总会在午后一点钟左右结束。因为,这个钟点已经到了午饭时间,人群逐渐离去。母亲挑来的西红柿还有一些没有卖完,此时肚子咕咕直叫。母亲一上午都没喝一口水,后来吃了我剩下的半边西瓜和一个西红柿充饥。快到两点钟的时候,热闹街道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穿梭的人群,地面上一片狼藉,仿佛有叫卖声、吆喝声、笑声在集市上空回荡。

那个年代,生活在忙碌和向往中继续。那时,能去赶集,特别是还能下馆子吃一碗木耳油豆腐丝加肉码子的面条,买几个包子几根油条带回家,能够吃一顿饱西瓜,一根绿豆冰棍,竟成了我一道抹不去的记忆。

如今,父母亲跟我到了省城,父亲经常做西红柿鸡蛋面当早餐。我们时常会聊起那段母亲带我到集市卖西红柿的记忆。每每想起,如和风拂面,温暖心田。

如今,故乡的集市今非昔比,羊场上(清江镇街道)旧貌换新颜,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一家家时尚商铺应运而生,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每每有机会回到老家,即便什么都不买,我总想去赶集。